

# 冷戰初期精神動員下的台灣古典詩壇\*

## ——以《臺灣詩壇》為研究中心

李知灝

中正大學台灣文學與創意應用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 摘要

冷戰初期的國共內戰讓台灣進入長時間的戒嚴體制，官方也持續進行精神動員。此時亦有具黨政身分的人士利用非官非民的灰色地帶，運用個人影響力進行精神動員。戰後來台的曾今可藉由他與台灣本地詩人、渡海詩人的來往，作為雙方交流的橋樑，進而建構「臺灣詩壇」社、接辦「全國詩人大會」、發行《臺灣詩壇》月刊。在過程中也讓具黨政高層身分的渡海詩人，如于右任、賈景德，取得詩壇「結構性從屬」的領導地位，並獲得進行精神動員的舞台。在最初「全國詩人大會」與《臺灣詩壇》的運作中，於「演說」、「命題」與「評選」等環節都可見精神動員的蹤跡。在詩人大會的「演說」裡，于、賈二人連結「詩人節」與台灣歷史，將之納入民族主義式的愛國精神結構。同樣的思考也出現在「命題」與「評選」環節，透過題目引導創作，以評選表彰符合精神動員價值觀的作品。從「全國詩人大會」的公開宣示與表彰，以及《臺灣詩壇》的課題評選印行，在相關作品中都可見冷戰初期台灣古典詩壇在精神動員下所造成的影響。

關鍵詞：精神動員、戰後初期、全國詩人大會、台灣古典詩、台灣文學

\* 本論文部分內容來自國科會計畫「寄往臺灣的詩箋：新加坡新聲詩社在臺發表作品探研」（MOST 112-2410-H-194 -099 -MY2）。感謝兩位審查委員為本論文提供寶貴建議，特此致謝。

# Mental Mobilization in Taiwan's Classical Poetry Scene during the Early Cold War:

A Study Centered on *Taiwan Poetry Monthly*

---

**Li Chi-Hao**

Associate Professor and the Director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Taiwan Literature and Innovation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 Abstract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Cold War, the Chinese Civil War led to a prolonged state of martial law in Taiwan, during which the government continuously engaged in mental mobilization. Amid this atmosphere, individuals with political affiliations exploited the gray area between official and civil spheres to leverage their personal influence for the sake of mobilization efforts. Tseng Chin-Ko, who migrated to Taiwan after the war, facilitated communication between local poets and those from across the Strait, which led to the formation of the Taiwan Poetry Society,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National Poets' Congress, and the publication of *Taiwan Poetry Monthly*. This process allowed prominent poets with political ties, such as Yu You-ren and Chia Ching-teh, to assume roles as “structural subordination” leaders within Taiwan's classical poetry scene, providing them with a platform

---

\* Li Chih-Hao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and the Director of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Taiwan Literature and Innovation at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Some content of this paper is derived from the MOST project “Poetic Letters to Taiwan: A Study of the Works of Singapore's New Voices Poetry Society in Taiwan” (MOST 112-2410-H-194 -099 -MY2). Thank you to the two anonymous reviewers for providing valuable suggestions for this paper. I hereby express my gratitude.

for mental mobilization. In the early stages of both the National Poets' Congress and *Taiwan Poetry Monthly*, traces of this mobilization can be seen in “speeches,” “prompts,” and “evaluations.” During the Congress, speeches by Yu and Chia linked “the Dragon Boat Festival—Qu Yuan—Poet’s Day” with Taiwan’s history, integrating it into a nationalist framework of patriotic sentiment. This line of thought also appeared in the areas of “prompts” and “evaluations,” guiding the creation of works that aligned with mobilization values. The public announcements and accolades from the National Poets’ Congress, along with the thematic selections and publications in *Taiwan Poetry Monthly*, demonstrate the significant impact of mental mobilization on Taiwan’s classical poetry scene during the early Cold War period.

**Keywords:** Mental Mobilization, Early Post-War Period, National Poets’ Congress, Taiwan Classical Poetry, Taiwan Literature





# 冷戰初期精神動員下的台灣古典詩壇

—— 以《臺灣詩壇》為研究中心

## 一、前言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國宣布投降，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但世界局勢並未因此歸於平靜。以美國、蘇聯兩大強權為首「民主／共產」陣營間的對抗，重塑了二戰後的國際情勢。由於美、蘇皆擁有核子武力，<sup>1</sup>兩國都極力避免進行直接武力對抗而爆發毀滅性核戰，取而代之的是在政治、經濟、科技上對抗，以及遍布全球的代理人戰爭。在中國爆發的「國共內戰」，即是冷戰初期兩大陣營對抗的縮影。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北京成立，中華民國政府撤退台灣，同時開啟38年的戒嚴統治。

在戒嚴時期，中華民國政府黨政高層相當注重對軍隊及社會不同層面的「精神動員」，將之視為國家存亡的關鍵。<sup>2</sup>相較於國家、軍隊針對人員、物資以命令所做的強制動員，所謂「精神動員」則強調透過文學創作、藝術展演與永無止境的教育、講習，將國家政策投射在社會各階層的民眾心中，建構出與敵對政權不同的意識形態與對抗意志。這樣的精神動員並不是靠政務系統一聲令下就能達成，必須仰賴不同場域的專業人士，依循各自場域內的結構與規則方能收效。如在1955年1月15日於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第一會議室舉行的「關於『思想領導及精神動員』案談話會紀錄」中，當時教育部長張其昀就報告「關於戰鬥文藝的

---

1 美國於1945年、蘇聯於1949年成功試爆核子彈。

2 如當時掌握軍隊政戰體系的蔣經國，在其對下屬的手函中寫到：「政工之成敗關係至大，可成而不可敗，故應注重政工人員之精神動員工作，務使人人能負責拚命，以國家之興亡為己任。」蔣經國，〈民國四十年十月二十日〔手函〕〉（來源：<https://presidentialcck.drn.gov.tw/index.php?act=Archive/preview/33832410b7d94782abb861523de6b78c>，檢索日期：2024.06.01）。

宣導，應結合黨內外文藝界人士來推行，收效始大。」<sup>3</sup>也可看出當時遷至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高層，透過政務、黨務等系統，配合不同場域的代表人物，在冷戰時期戒嚴體制下台灣進行精神動員的方向。

除了官方長期進行反共國策的宣示與行動，在文學場域還有部分處於「非官非民」的灰色地帶。在過去對於冷戰時期台灣文學的研究，多著重在中華民國政府官方或者是美國新聞處以政令宣導或經費挹注對藝文界的影響，<sup>4</sup>但在當時還有一些灰色地帶仍待探討。這樣的灰色地帶大多是具有黨政身分的人士運用個人影響力，結合文學場域相關人士，動用官方、民間有形無形的資本，在官方體制外建構組織、推行運動，擴張個人人脈網絡。當中也注入官員個人意志，或呼應官方政策來進行精神動員，而在冷戰初期的台灣古典詩壇即有如此現象。

古典詩在清帝國長期以科舉取士的過程中，逐漸變成台灣地方士紳的基本素養。在清帝國統治時期，奉派來台的官員也運用古典詩作為媒介，邀集士紳吟詩聯絡感情，形成「官紳唱和」的現象。在日本帝國統治台灣時期，殖民政權同樣以古典詩為媒介，邀集台灣本地詩人舉辦活動並進行書寫。如兒玉源太郎、上山滿之進，都曾邀集台灣詩人開雅集聚會，最後編成《南菜園唱和集》、《東閣唱和集》。在戰後，也可看到具有黨政身分的渡海詩人頻繁與台灣本地詩人進行唱和，並且一同發起詩社組織、舉辦活動、發行刊物，最終誕生「全國詩人大會」這樣的大型聚會活動。

在冷戰初期，台灣古典詩壇最鮮明的特徵就是這些無論是詩人活動或是詩刊

---

3 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關於『思想領導及精神動員』案談話會紀錄〉（來源：<https://www.cipas.gov.tw/stories/16?fbclid=IwAR1tP2NexxaIQXMGSKhSi-PRt0MIllJrHucRXiFKV4ld9JHP9Y38O9D64Wc>，檢索日期：2024.06.01）。

4 例如陳建忠在〈「美新處」（USIS）與臺灣文學史重寫：以美援文藝體制下的臺、港雜誌出版為考察中心〉中，探討美國新聞處影響台灣文學發展的過程，最終論述：「通過『國家文藝體制』與『美援文藝體制』的框架，一剛（直接）一柔（間接）之間，我們才更能解釋戒嚴與冷戰時代裡，處於流亡與反共階段的台灣社會，為何會出現大量具有合法性、組織性的文藝活動，因為國家文藝體制與美援文藝體制，都是以國家權力發動，具有文化霸權意味的體制。」即強調在兩個國家體制對台灣現代文學發展的影響。見陳建忠，《島嶼風聲：冷戰氛圍下的臺灣文學及其外》（新北：南十字星文化工作室，2018.08），頁71。

雜誌，都有具黨政身分的渡海詩人掛名譽職，如于右任、賈景德。這些詩人為何如此積極出現在台灣本地詩人、詩社的活動場合？或許就是要造成「結構性從屬」。皮耶·布赫迪厄（Pierre Bourdieu）在探討文學場域的運作時，就發現有「結構性從屬」的現象，這現象影響文學場域的途徑有二：一是透過市場的銷量機制；一則是靠價值體系的某種「來往」。如以這二條路徑對台灣文學場域進行觀察，古典詩壇應是後者。在其《藝術的法則》就論述其大致樣貌：

經由以生活風格與價值體系的某些相似性為基礎的各種長期來往，這些長期的來往，尤其是沙龍這個場合裡，就結合了至少某一部分的作家跟上流社會的某些派系，也幫忙為來自國家這個贊助者的慷慨賞賜引導了去向。<sup>5</sup>

這些具黨政身分的渡海詩人憑藉其熟悉的古典詩創作，作為與台灣本地詩人交往的媒介，成為雙方長期往來的基礎。進一步統合雙方的價值體系，更擴張到詩人大會與詩刊發行，產生戰後初期台灣古典詩壇的「結構性從屬」。而價值體系統合的過程，就可看出一些精神動員的舉措，原本精神動員就是一種激發內在動力、凝聚共識並且讓被影響者產生行動的過程。而精神動員所造成的影響，則可在當時留下的文獻略窺一二。

在 1950 年代發行的古典詩刊雜誌裡，《臺灣詩壇》是最早發刊，也是目前文獻保存較完整的刊物之一，同時也記載著早期全國詩人大會的相關作品。正如其〈創刊詞〉所言，「同人等因集資發刊『臺灣詩壇』（月刊）第一期於辛卯端陽詩人節出版。」<sup>6</sup>在《臺灣詩壇》第 1 卷第 2 期封面更有「辛卯端午全國詩人大會特刊」的字樣。<sup>7</sup>《臺灣詩壇》作為與「全國詩人大會」幾乎同時創立的刊物，

5 Pierre Bourdieu（皮耶·布赫迪厄）著，石武耕、李沉淞、陳羚芝譯，《藝術的法則——文學場域的生成與結構》（台北：典藏藝術家庭，2016.02），頁 97。

6 編者，〈創刊詞〉，《臺灣詩壇》1 卷 1 期（1951.06），封面頁。

7 《臺灣詩壇》1 卷 2 期（1951.07），封面頁。

也刊載早期詩人大會作品與貴賓講稿，在意義上等同於「全國詩人大會」的附屬刊物。但在沒有舉辦詩人大會的時期，又有其獨立運作的空間，刊載國內外詩人的作品，舉辦自己的課題徵詩活動。這份詩刊雜誌為何在當時有這樣的影響力？又是甚麼人創建這份刊物？這些黨政身分詩人如何透過詩人聚會與書寫的相關機制，在冷戰初期對台灣古典詩壇進行精神動員？以《臺灣詩壇》作為切入點，將可進一步了解其過程。

## 二、《臺灣詩壇》的創建與經營

《臺灣詩壇》的創刊與戰後渡海詩人曾今可有密切相關。曾今可（1901-1971.09.20），江西泰和人，譜名學營、字國珍、號今可。早年就讀江西省立第四中學，五四運動時任贛南學生聯合會總幹事時，率眾搗毀日貨而遭開除學籍，後投身軍旅任江西省防第四團司書。1924 到 1926 年間留學日本，取得中央大學文學士學位。1928 年流連於上海加入「南社」，1931 年創辦新時代書局、主編《新時代》月刊、組織「文藝座談會」、推動「詞的解放」。但隨後遭魯迅撰文批評，又遭左翼報刊抨擊而離開上海文壇，再度赴日本就讀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科。1935 年返回中國任職審計部浙江省審計處。1937 年中日戰爭爆發，先後擔任江西省保安司令部政治部上校科長兼江西「政治日報社」社長、浙江省抗敵自衛總部上校科長、湘鄂贛邊區挺進軍總部少將參議兼「開平日報社」社長、西南游擊幹部訓練班上校政治教官、中央軍官學校上校政治教官等職，均為文職掛軍銜，從事政戰工作。

1945 年 10 月曾今可隨軍來台，除擔任上海《申報》特派員，還兼任台灣省行政幹部訓練團國文講師。在此時曾今可開始與台灣本地詩人有所接觸，並參與台灣古典詩壇的相關活動。他在〈追懷楊仲佐先生〉一文描述當時情況：

我於民國三十四年十月由福建隨軍來臺灣，任上海申報駐臺特派員，兼臺灣省行政幹部訓練團國文講師。……該團不招生，學生完全由全省各縣市政府

之秘書、科長、鄉鎮長、中等學校校長及國文教員調訓，半年畢業。我教的是第一期。從學生們的口中，我知道各縣市甚至各鄉鎮都有詩社，每社有社員數十人或數百人。這是全國各省所無的盛況。在很短的時間內，我被瀛社（當時的社長是謝雪漁先生（秀才），副社長是魏清德先生）邀宴，並參加「擊鉢吟詩」。<sup>8</sup>

由其自述可知，曾今可透過指導地方基層行政幹部國文，獲得台灣各地詩社的資訊，並獲得與著名詩人，同時也是地方有力人士碰面的機會。由於地緣之便，曾今可首先與台北的瀛社有所接觸，並利用公餘閒暇前往台灣各地拜訪詩社與知名詩人。<sup>9</sup>

隨後 1946 年 3 月曾今可應台灣警備總部參謀長的柯遠芬之邀，擔任其創建的「正氣學社」總幹事，並主編《正氣半月刊》、《正氣月刊》及「正氣叢書」。<sup>10</sup> 1947 年柯遠芬因為二二八事件被調職後，曾今可又在 10 月於台灣警備總部副司令鈕先銘手下主編《建國月刊》。原本在中日戰爭時期，曾今可於中國東南一帶從事政戰工作就曾編輯《正氣》、《建國》。而戰後將其搬到台灣成為《正氣月刊》、《建國月刊》，以政戰工作的模式，利用非官非民的灰色地帶宣揚政策，進行精神動員。<sup>11</sup>

8 曾今可，〈追懷楊仲佐先生〉，《中華詩學》4 卷 1 期（1970.12），頁 48。

9 在曾今可〈臺灣的詩社〉文中也提到他親自到台灣各地詩社拜訪，如台中櫟社。曾今可，〈臺灣的詩社〉，《中華詩學》1 卷 1 期（1969.06），頁 44-46。

10 曾今可在其〈送柯遠芬將軍赴美考察〉詩後詳細說明當時他與柯遠芬的關係：「柯將軍於日本投降後，坐鎮臺灣。因見接收人員貪污成風，乃籌設『正氣學社』，自兼社長，邀請省級各單位首長兼任幹事。推余任總幹事，主持國文國語補習班，並主編『正氣月刊』及『正氣叢書』以宣揚正氣，指斥貪汙，啟發民族思想。」曾今可，〈送柯遠芬將軍赴美考察〉，《詩文之友》11 卷 2、3 期合刊（1959.07），頁 1-2。相關論述可參見顧敏耀，〈《正氣月刊》提要〉（來源：<https://db.nml.gov.tw/Site4/s3/journalinfo?jno=041>，檢索日期：2024.10.24）

11 正如黃美娥文中所說：「戰前曾由曾今可一手包辦的《正氣》與《建國》，戰後也先後於臺灣以《正氣月刊》、《建國月刊》的名義與形式復刊。……從《正氣》到《正氣月刊》，及其移動、轉向與在臺復刊的過程，所呈顯的正是東南文人與東南文藝運動在臺灣的解散與重構，以及介入軍方系統的顯影。」見黃美娥，〈省外

較為特別的是在這些刊物曾今可以「臺灣詩壇」為專欄名，將台灣本地詩人黃純青、謝雪漁、魏清德、楊仲佐、林獻堂等人的作品刊載其中。足見他已結識許多台灣古典詩壇的重要人物，更開始促成台灣詩人與黨政高層、渡海詩人間的交流。他在《臺灣詩選》的〈編者序〉裡就陳述 1948 年端午詩人節推動雅集的過程：

可並建議魏主席於端陽詩人節，設筵臺北賓館，招待全臺各地名詩人，以繼東閣聯吟韻事。魏以不能詩自謙，改由鈕先銘將軍招待，此乃臺灣光復後第一次盛會。<sup>12</sup>

而他在〈詩人在台灣〉一文中也陳述雅集的過程：

去年（1948）詩人節，鈕先銘將軍在其官邸舉行「端陽聯吟會」，到臺省名詩人林獻堂、黃純青、謝汝銓、魏清德、楊仲佐、謝尊五等近百人，且有從基隆、新竹、臺中、臺南、花蓮港等地遠道而來者，外省詩人到者亦有數十人。<sup>13</sup>

由上述可知，曾今可原本期待當時臺灣省政府主席魏道明能出來主持雅集，以繼日治時期台灣總督上山滿之進邀集詩人雅集唱和，成為台灣史上之盛事。但魏道明顯然不好此道，以自身不懂古典詩而讓鈕先銘代表。而前來參加的詩人除來自台灣各地的本土詩人，更有戰後渡海詩人。這樣集合了統治階層重要人士與本地仕紳，同時讓台灣本地詩人與渡海詩人共聚一堂的交流雅集，猶如日本總督邀集

---

文人與戰後臺灣文學場域關係研究的幾點思考（1945-1960）——以「東南文藝作家群」為考察起點，蘇費翔、簡若珮主編，《異口同「聲」——探索臺灣現代文學創作的多元發展》（台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2022.05），頁 44-45。

12 曾今可編，《臺灣詩選》（台北：中國詩壇，1953.10），頁 6。

13 曾今可，〈詩人在台灣〉，《臺灣詩報》1 卷 1 期（1949.01），頁 5。

詩人聚會的翻版。

不過與日治時期有所不同的是，這場雅集聚會舉辦的時間與名目。在日治時期的台灣並沒有「詩人節」的概念，當時「全島詩人大會」也不是在端午舉辦。「詩人節」出現在中日戰爭時期 1941 年的重慶，<sup>14</sup> 將屈原去國懷憂、自沉汨羅江的故事詮釋為愛國的舉措。藉端午節紀念屈原的同時，鼓勵軍民抗日的愛國行為，因此「詩人節」本身就帶有精神動員的意味。曾今可在 1948 年將這個節日與台灣原有的詩人雅集結合，將端午節詩人聚會置入愛國的敘事裡，也成為後來在端午節（同時也是詩人節）舉辦「全國詩人大會」的基調。

同年，曾今可獲林獻堂邀請擔任「臺灣省通志館」主任秘書，<sup>15</sup> 後通志館改組為「臺灣省文獻委員會」（以下簡稱「省文獻會」）。在這段期間曾今可創建一個組織——「臺灣詩壇」，並發行《臺灣詩報》。曾今可在《臺灣詩報》的〈創刊旨趣〉中就說：

「臺灣詩壇」為唯一之全省性定期詩報，亦為全國空前未有之詩刊。……惟向無組織，亦無基金，僅附於建國月刊出版；篇幅既無多，流傳亦難廣。現特廣徵社員，設立理監事會，獨立出版臺灣詩報（月刊）。<sup>16</sup>

且在該刊第二期刊出的「臺灣詩壇理監事名單」，理事長為當時「臺灣省通志館」館長、也是後來省文獻會第一任主委的林獻堂、理事兼詩報社社長為後來省文獻會第二任主委的黃純青。理監事名單有渡海詩人梁寒操、鈕先銘、易君左、曾今可等，台灣本地詩人有林熊祥、黃水沛、謝汝銓、魏清德、陳逢源、陳滿盈、賴惠川、鄭坤五、盧纘祥、李德和等人。<sup>17</sup> 「臺灣詩壇」社的成立與《臺灣詩報》

14 〈記首屆詩人節〉，《中央日報》，1941.05.31，3 版。而于右任就是當年慶祝大會的主席，並發表演說。

15 曾今可，〈追懷楊仲佐先生〉，《中華詩學》4 卷 1 期，頁 49。

16 曾今可，〈創刊旨趣〉，《臺灣詩報》1 卷 1 期（1949.01），頁 1。

17 「臺灣詩壇理監事名單」，《臺灣詩報》1 卷 2 期（1949.02），頁 1。

的發刊，看似獲得林獻堂、黃純青、林熊祥等人的支持，<sup>18</sup> 以及台灣本地重要詩人與渡海詩人的參與，但從社址設在「臺北市金門街廿四巷十四號」<sup>19</sup> 曾今可自宅的情況來看，這個組織與刊物應該仍是由曾今可主導，其他人只是贊助者或是參與者的身分。隨著林獻堂在 1949 年 9 月離開台灣，這個新成立的「臺灣詩壇」社後續並沒有更多活動，《臺灣詩報》這份刊物僅出刊 2 期就停刊。

雖然在此時期曾今可籌組「臺灣詩壇」社、發行《臺灣詩報》的運作並不成功，但過程中在台灣各地持續擴大與本地詩人的交往，再加上他過去在中國大陸的黨政、文化人脈。這些優勢讓曾今可在 1949 年中華民國政府遷台，成為台灣本地詩人與渡海詩人間的橋樑。尤其是當同為「南社」<sup>20</sup> 社員、在中日戰爭時推動「詩人節」的于右任來台後，曾今可更是如魚得水，熱衷於邀集詩人聚會。正如黃美娥所評述：

他（曾今可）還成功扮演了當時臺灣省內外古典文人往來交流的詩人橋樑聯繫者。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于右任於 1949 年 10 月來臺，至 1964 年 11 月 10 日過世為止，曾今可一直積極介紹很多臺灣詩人與右老相識，並透過小型詩會，或舉辦全國詩人大會，拉近于氏與臺灣詩人的距離。<sup>21</sup>

在中華民國政府遷台前，曾今可主要邀集台灣本地詩人與當時駐台高層官員會面，但是到了 1949 年 10 月于右任以及其他中華民國政府高層要員來台後，曾今可轉而邀請這些政府高層與台灣本地詩人唱和。以于右任為首，在上巳、重陽等傳統民俗節日舉辦士林登高、新蘭亭禊集等名目的詩人雅集，當中都可以看到曾今可的身影。曾今可如此積極建立雙方唱酬的空間，作為彼此交流的橋樑，就

18 這三人分別是「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前三任主委。

19 日後《臺灣詩壇》月刊的出版地址也設於此處。

20 此「南社」為 1909 年柳亞子、陳去病在蘇州所創立，與 1906 年在台南府城創立的「南社」無關。

21 黃美娥，〈戰後臺灣文學典範的建構與挑戰：從魯迅到于右任——兼論新／舊文學地位的消長〉，《臺灣史研究》22 卷 4 期（2015.12），頁 126。

類似皮耶·布赫迪厄所言法國「沙龍」讓「某一部分的作家跟上流社會的某些派系」<sup>22</sup>，建立「來往」的關係，進而產生「結構性從屬」的效應，從中影響台灣古典詩壇的運作。

到了 1950 年，這樣沙龍式的詩人雅集進一步擴大成「全國詩人大會」的規模。以黃純青、林熊祥主導的「薇閣詩社」號召全台詩人舉辦「庚寅端午節全國詩人大會」，翌年又加入于右任、賈景德與黃純青領銜舉辦「辛卯端午節全國詩人大會」，成為後來舉辦全國詩人大會的模式。曾今可雖寄身省文獻會擔任主任秘書，憑藉他與渡海詩人、本土詩人的人脈網絡，特別是與于、賈等黨政高層的關係，再加上省文獻會前後任主委黃純青、林熊祥的支持，由這些有力人士擔任發起人，逐步讓「臺灣詩壇」社發展成可以接辦「全國詩人大會」，並從中主導其運作的型態。正如林文龍在〈省文獻會與漢詩關係初探〉一文中考察：

1951 年，詩壇乃醞釀舉辦「全國」詩人大會，敦請于右任、賈景德及黃純青三老發起，於端午詩人節當天在臺北市中山堂光復堂舉行全國詩人大會。這是全國詩會的開始，翌年（1952）壬辰全國詩會，便由「臺灣詩壇」社接辦。……此後各年全國詩會便循例由「臺灣詩壇」社主辦。<sup>23</sup>

曾今可將原本已經停滯狀態的「臺灣詩壇」社的名號重新搬出，除了在 1952 年開始公開以此名義接辦全國詩人大會，同時也以此名義發行《臺灣詩壇》月刊、編印《臺灣詩選》。<sup>24</sup> 而在〈臺灣的詩社〉一文就簡述創辦的過程：

「臺灣詩壇」：為黃景南先生與余合力創辦，發行「臺灣詩壇」月刊，余為

22 Pierre Bourdieu（皮耶·布赫迪厄）著，石武耕、李沅洳、陳羚芝譯，《藝術的法則——文學場域的生成與結構》，頁 97。

23 林文龍，〈省文獻會與漢詩關係初探〉，《臺灣文獻》59 卷 2 期（2008.06），頁 171。

24 《臺灣詩選》的徵集與編印雖都透過「臺灣詩壇」社進行，但出版時發行單位卻標示「中國詩壇」，何以如此？在曾今可〈編者序〉中提到：「並於是日創刊《臺灣詩壇》月刊（反攻時將創刊『中國詩壇』月刊隨軍

發行人，黃為經理，編印發行出納一切由黃負責，余向不過問。旋余請于右任先生出任名譽社長，賈景德先生出任社長，並由景南商得余之同意，請林熊祥、陳逢源先生為副社長。<sup>25</sup>

在這篇日後追述的文章裡，曾今可宛如「刮除重寫」般，不提過去在 1949 年曾推舉林獻堂為理事長的「臺灣詩壇」社，而將後來在 1952 年發行《臺灣詩壇》月刊的「臺灣詩壇」社作為他與北台詩人黃景南<sup>26</sup>共同創辦的新組織。雖然曾今可自言「余向不過問」，但從黃景南仍須徵得曾今可同意，才邀請林熊祥、陳逢源擔任副社長來看，當時的主導者還是曾今可，黃景南則是包辦詩刊發行等事務工作。而在發刊《臺灣詩壇》3 卷 1 期時也將于、賈二人分別列名名譽社長與社長，林熊祥、陳逢源為副社長。雖然在成員上如此顧及省籍平衡，但整體而言主導權還是在渡海詩人手上，就如曾今可在該文後提到「以外省人為主幹」的詩社中，「臺灣詩壇」就名列其中。<sup>27</sup>從這種種跡象看來，當時「臺灣詩壇」社內部，其實就呈現一種權力不對等的狀態。

而且從《臺灣詩報》到《臺灣詩壇》重要名譽頭銜配置的改變來看，發行經費已不再是第一要務。能出資贊助的台灣本地詩人雖然重要，但也僅能位居副手的位置。在冷戰初期戒嚴體制下的台灣文化界，取得政治正當性成為第一要務，

前進)」曾今可，〈編者序〉，《臺灣詩選》，頁 19。當中或有一些難言之隱，導致該書出版單位必須標示「中國詩壇」。參照林衡道晚年回憶之前在 1949 年臺灣省文獻會發行「文獻專刊」時，曾因規劃以台灣民主國的藍地黃虎旗為封面，就被外省籍委員指為台獨。見林衡道口述，卓遵宏、林秋敏訪問，林秋敏紀錄整理，《林衡道先生訪談錄》（台北：國史館，1996），頁 325。或許就是《臺灣詩選》發行單位改名的原因，但「中國詩壇」之名此後就鮮少出現。

25 曾今可，〈臺灣的詩社〉，《中華詩學》1 卷 1 期，頁 45。

26 《三峽鎮鎮誌·人物誌》中記載其生平事蹟：「黃景南，字雲谷，號潛廬，別號世外逸人，生於大正八年（1919），三峽鳶山人。性好學，慕顏筍山、林述三、杜仰山三先生淵博，執贄為弟子，兼從學詩。……嘗為南樓書會長，臺北心社員，臺灣藝術社漢文主筆。迨臺灣光復，即追隨于右任、賈景德、吳敬恆諸老，創刊《臺灣詩壇》，任總編輯。後兼自立晚報『自立詩壇』與『藝苑』編輯。……民國七十九年（1990）卒，享年七十二歲。」王明義，《三峽鎮鎮誌》（台北：三峽鎮公所，1993），頁 1598-1599。

27 曾今可〈臺灣的詩社〉文中提到：「在臺北方面……光復後以外省人為主幹的『臺灣詩壇』、『春人社』、『寄社』、『臺鐵詩社』、『瀛洲詩社』、『後樂詩社』、『明夷詩社』等。」同註 25，頁 46。

這也讓身居黨政高層的渡海詩人在詩壇地位競逐上有著絕對的優勢。

另一方面，有了于右任、賈景德等黨政高層的加持，除確保在政治方面不受侵擾，更讓《臺灣詩壇》的影響力擴至台灣以外的地區。如曾今可在1953年的〈新年獻詞〉中提到：

月前全世界各地華僑領袖回國出席僑務會議，今可曾於于院長官邸先後與僑領多人晤談，承告各地僑胞中，詩人頗多，且皆愛讀本刊。每期寄到，莫不先睹為快，甚至有輾轉借閱者，聞之殊為感奮。<sup>28</sup>

由上文可看到透過于右任的引介，曾今可得以結識各地僑領，進一步將《臺灣詩壇》推向世界各地，曾今可更自豪的說《臺灣詩壇》的「讀者遍自由世界各國」。<sup>29</sup>因為當時有來自日本、香港、泰國、新加坡、馬來西亞、美國等地詩人的投稿而在詩刊裡開設「扶桑詩選」、「海外詩輯」的專欄。《臺灣詩壇》之所以能拓展對海外詩壇影響力，應是夾帶于、賈二人的影響力才有如此成績。如當時新加坡重要詩人李俊承在《臺灣詩壇》發表的第一首作品為〈感懷寄韜園〉，<sup>30</sup>就是寄給賈景德<sup>31</sup>的詩作，此後也持續投稿此刊。

由戰後初期渡海來台到1950年代初期，曾今可無論在台灣還是海外古典詩壇的影響力都扶搖直上，就如林文龍〈省文獻會與漢詩關係初探〉一文所評述：「曾今可由於兼具黨政軍背景，且熱衷漢詩，在戒嚴時代的臺灣，對於漢詩的推

28 曾今可，〈新年獻詞〉，《臺灣詩壇》4卷1期（1953.01），頁3。

29 曾今可，〈發刊詞〉，《鯤南詩苑》1卷1期（1956.06），頁1-2。

30 李俊承〈感懷寄韜園〉為：「禪意歸詩卷，榮枯付等閒。煙雲生筆底，桃李滿人間。淚下惟憂國，吟成只看山。昇平消息近，佇趁好風還。」表達他在新加坡對國家淪亡的哀傷，以及期待收復故國恢復昇平的期待。李俊承，〈感懷寄韜園〉，《臺灣詩壇》4卷3期（1953.03），頁22。李俊承（1888-1966），字元賢，原祖籍福建永春。1905年渡海至星馬地區習商，歷任和豐銀行總經理、華僑銀行董事、同德書報社副社長、新加坡中華總商會會長。1958年曾參與新聲詩社的創立，著有《覺園詩集》、《覺園詩存》、《佛國遊記》等。

31 賈景德，號韜園。

動，發揮了重要的影響力，成了省文獻會初期最活躍的詩人之一。」<sup>32</sup> 其影響力除了可以邀集黨政高層與台灣重要詩人聚會，更創建「臺灣詩壇」社並《臺灣詩壇》雜誌、辦理「全國詩人大會」，這都是此前台灣文學史發展中少有的例子。

然而 1958 年後半年，曾今可透過「臺灣詩壇」建構的詩壇影響力遭遇一連串的重挫。當時《臺灣詩壇》第 15 卷各期的出版項就只標明年份而沒有月份，且後續各期的出刊時間亦有延遲的情況。<sup>33</sup> 如對照相關機關、人士的紀錄來看，《臺灣詩壇》開始出現延遲出刊，或與當年 4 月臺灣省政府組織精簡有關。因為精簡組織，省文獻會由二級機關改為三級機關，改隸屬於民政廳。雖然不知道實際影響層面如何，但從省文獻會降級後，《臺灣詩壇》月刊的出刊即受到影響的跡象來看，曾今可在編纂這份刊物時，應有從文獻會獲得資源。到了 1960 年林熊祥辭去省文獻會主委一職，《臺灣詩壇》月刊最後就停留在當年出刊的第 17 卷第 2 期。

除《臺灣詩壇》月刊停刊，原本由「臺灣詩壇」社接辦的「全國詩人大會」似也受到影響，除 1959、1961、1962 年的詩人大會停辦外，更在 1963 年後改由其他詩刊社來辦理，如林文龍在〈省文獻會與漢詩關係初探〉一文中考察：

1960 年庚子在臺中市，1961 年停辦，同年冬，賈景德病逝，<sup>34</sup> 1962 年仍停辦，之後這項由「臺灣詩壇」社主辦的全國詩會不再見於文獻記載，成為絕響。

目前可知 1963 年的全國詩會已經改由「詩文之友社」主辦，在中部舉行。<sup>35</sup>

在 1960 年林熊祥辭去臺灣省文獻委員會主委，到後來賈景德突然因心臟病發逝世，就造成此後二年的全國詩人大會停辦、《臺灣詩壇》月刊停刊，也可知這樣

32 林文龍，〈省文獻會與漢詩關係初探〉，《臺灣文獻》59 卷 2 期，頁 143-144。

33 如《臺灣詩壇》15 卷 5 期按照過去出刊時程，應於 1958 年 11 月出刊，但封底出版項僅標註「民國四十八年」（1959）而無月份，已有拖延出刊的情況。

34 案：賈景德因為心臟病發，逝世於 1960 年 10 月 20 日。此處應誤。

35 同註 32，頁 171。

的人事變動對曾今可在古典詩壇的運作產生相當巨大的影響。不過對於詩人大會停辦，曾今可也曾作詩加以辯駁。如他在〈詩人節席上拜讀張魯老大作有「未堪賈傅風流歇，詞客淒清倏二年」句感作〉有「又逢詩人節，無計開大會」之句，其後有註云：

每年端午曾先後於各地舉行全國詩人大會，于右老為名譽會長，每年由地方政府招待詩人，有所未便。故近兩年改在臺北歷史博物館小集。大會非因賈煜老作古而中輟也。<sup>36</sup>

他特別強調詩人大會的停辦是體恤地方政府招待詩人有所不便，才將規模縮小，並不是因為賈景德的逝世造成。然而值得思考的是，全國詩人大會從 1951 年到 1954 年都在台北市舉辦，其後才輾轉到台南、嘉義、彰化、台東與台中與當地詩社、地方政府合作辦理。但就如此湊巧在賈景德逝世後，「臺灣詩壇」社不僅不能到各地舉辦詩人大會，連在原本就長期接辦全國詩人大會的台北市也無法再辦大會，只能在歷史博物館舉辦小型雅集。這或許不是單一事件所影響，在 1958 年省文獻會降級，1960 年林熊祥辭去省文獻會主委，由李騰嶽接任。<sup>37</sup> 這一連串的事件確實造成曾今可無法維持以于、賈二人為首，來號召各地辦理全國詩人大會的體制。而在賈景德 1960 年、于右任 1964 年相繼逝世後，曾今可更是難以有

36 曾今可，〈詩人節席上拜讀張魯老大作有「未堪賈傅風流歇，詞客淒清倏二年」句感作〉，《詩文之友》16 卷 5 期（1962.08），頁 8。

37 林道衡在後來追憶當時黃純青、林熊祥、李騰嶽三位前後任臺灣省文獻委員會主委的處事風格時，曾提到黃純青喜歡熱鬧排場與詩社聚會，林熊祥則是用自己的錢來維持詩社聚會，但因為不諳官場之道，觸怒省府要人而導致省文獻會降級。見林衡道口述，陳三井、許雪姬訪問，楊明哲紀錄，《林衡道先生訪問紀錄》（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頁 109-112。另外根據《林衡道先生訪談錄》所言：「因為李騰嶽原本原本是醫生，收入都是點滴辛苦賺來的，所以看錢看得很重，連公家的錢都一樣，如果他認為屬下的出差非必要，就不准申請差旅費；……此外，詩社的活動也停止了。」或因此不再支持「全國詩人大會」的舉辦。林衡道口述，卓遠宏、林秋敏訪問，林秋敏紀錄整理，《林衡道先生訪談錄》，頁 328。

號召力可以鼓動省政府、縣市政府與黨部等機構，<sup>38</sup>繼續支持辦理全國詩人大會這樣的大型集會活動。

在《臺灣詩壇》月刊停刊，又失去全國詩人大會這個舞台，曾今可雖然不再像過去能帶動詩壇活動，但他仍持續舉辦一些小型活動，或撰文記錄戰後初期台灣古典詩壇掌故。在〈臺灣的詩社〉一文曾今可就提到：「『臺灣詩壇』仍每年於于右老冥誕舉行名家書畫展覽會一次，以資紀念。」<sup>39</sup>由此可見，雖然《臺灣詩壇》月刊不復出刊，曾今可仍以一己之力用「臺灣詩壇」社的名義持續舉辦書畫展覽會，來紀念這段結合于右任、賈景德等渡海詩人與當時台灣古典詩壇密切交流的歲月。

### 三、「全國詩人大會」的精神宣示

戰後曾今可積極涉入台灣古典詩壇，與各地重要詩人建構一定的來往關係，而後來成為他引導詩壇的資本，使他成為渡海詩人與本地詩人間的聯繫橋梁。透過小型的詩人雅集活動凝聚核心人物，進而擴大舉辦「全國詩人大會」、發行《臺灣詩壇》月刊，這都是由曾今可過去聯繫的人脈網絡所建構的古典詩活動場域。但在這場域裡其實有一種權力不對等的狀況，具有黨政高層身分的渡海詩人，因冷戰時期的戒嚴體制與他們所具的政治地位，讓他們在台灣古典詩壇有絕對的優勢地位。在舉辦「全國詩人大會」的過程中，渡海詩人都站在領銜發起的地位。如1951年5月18日《中央日報》報導當時即將舉辦「全國詩人大會」時提到：

于右任、賈景德、黃純青三老發起於六月九日（端午）召集本省各縣市著名詩社社員，由該社長選代表及內地寓台名詩家共六百二十五名，在中山堂舉

38 曾今可在《臺灣詩壇》3卷1期的〈卷頭贅語〉說到：「本年詩人節乃由本壇籌備召開全國詩人大會，……臺省府吳主席及臺北市議會、市黨部、市政府盛筵招待大會全體詩翁。」由此可見，雖然掛名「臺灣詩壇」社舉辦全國詩人大會，但是相關經費與人力還是需要多方支持。曾今可，〈卷頭贅語〉，《臺灣詩壇》3卷1期（1952.07），頁3。

39 曾今可，〈臺灣的詩社〉，《中華詩學》1卷1期，頁44-46。

行慶祝詩人節兼開全國詩人大會，詩題：（一）臺灣是民主自由之燈塔（二）辛卯詩人節懷沈斯庵。不拘體韻，限本月底以前將詩稿寄交臺北市延平南路一〇九號臺灣省文獻委員會……。<sup>40</sup>

在報導中，以具有黨政高層身分的于右任、賈景德，再加上時任省文獻會主委的本地詩人黃純青領銜，公開號召此次的「全國詩人大會」。由報導裡可以看到一個被階層化的古典詩壇結構，在核心群足以號召詩壇的人中，前二位是具黨政高層身分者。而底層被動員的詩人群則分為二類，一是渡海詩人中的「名家」，二是台灣本地詩社的「社長」及其挑選的代表。雖然在報導中不見曾今可的身影，但從徵詩稿件寄交省文獻會的情況來看，實際主導這項活動的應是時任該會主任秘書的曾今可。

而在這年舉辦「全國詩人大會」時，曾今可也藉機發行《臺灣詩壇》月刊第1期，並於現場發放給各地詩人。但當時留下的文獻較少，難以判斷曾今可涉入程度。不過到翌年的詩人大會，曾今可利用「臺灣詩壇」社作為民間社團的身分，引入官方資源舉辦活動的情況就相當明顯。在當期的〈編後記〉裡就詳盡報導該次詩人大會的過程。首先是當年舉辦「壬辰全國詩人大會」，在「臺灣詩壇」社主辦的籌備會裡，推舉于右任為名譽主任委員、賈景德為主任委員，陳逢源與林熊祥則擔任副主任委員，同時也讓他們成為《臺灣詩壇》月刊的名譽社長、社長與副社長。<sup>41</sup> 接著文中描述當天「全國詩人大會」現場情況：

五月五日（即國曆五月廿八日），天朗氣清，假臺北市中山堂大禮堂為會所，九時入場，千五百餘詩人，先後到齊。各界來賓，王世杰、白崇禧、莫德惠、洪蘭友、鄧文儀、黃伯度、桂永清、朱家驊、張昭芹、程天放、蕭自誠、陳雪屏、黃國書、謝徵孚諸公及中國文藝協會新詩人紀弦、宋膺等數十人，亦

40 〈于右任等發起 詩人大會 定詩人節集會〉，《中央日報》，1951.05.18，4版。

41 編者，〈編後記〉，《臺灣詩壇》3卷1期（1952.07），頁40。

翩然落止。<sup>42</sup>

在文中可見由于、賈二人領銜主辦的「全國詩人大會」除邀集了一千五百餘位詩人與會，連原本於古典詩壇無涉的政要也蒞臨現場，當中還有新詩界的紀弦等人也一同參與這個屬於「詩人」的盛會。但在這樣的場合，詩人大會的主任委員、時任國大代表的賈景德有相對優勢的發言權，在報導中指出：

十點開會由主任委員賈景德主席，行禮如儀後，首致長達三千言之演詞，強調詩言志歌永言，可以發揚生機，保持正氣之旨。繼由教育部長程天放、詩人安禪致辭後，即由副主任委員林熊祥宣讀行政院長陳誠、總統府資政許世英暨中國文藝協會等各方面賀電。十一點禮成後全體詩人千五百餘人在中山堂正門廣場攝影留念。<sup>43</sup>

在大會開端就以賈景德的演說揭開序幕，且演說占這個歷時僅一小時的開幕儀式相當的份量。在政要、貴賓致詞結束後，又由林熊祥上台宣讀來自各方面的賀電。從上台順序的安排就可看到賈景德掌握了最大的發言權，而古典詩人的發言地位與長度，在這樣的場合明顯優於新詩詩人。

在報導後段也指出，當日在中午由臺灣省政府主席吳國楨款待酒宴，直到下午才開始擊鉢聯吟，直到傍晚六點散會，七點由臺北市政府、市議會、市黨部聯合歡宴舉辦晚宴款待詩人。<sup>44</sup> 隔年，鄭品聰在〈癸巳詩人節大會經過報告〉裡，亦呈現當年「全國詩人大會」也是以這樣的模式辦理。<sup>45</sup> 由此也可見，透過引入于、賈的政治威望，不只曾今可能獲得臺灣省政府、臺北市政府、市議會、市黨

42 同註 41，頁 40。

43 同註 41，頁 40。

44 同註 41，頁 40。

45 鄭品聰，〈癸巳詩人節大會經過報告〉，《臺灣詩壇》5卷1期（1953.07），頁3。

部等單位的資源與協助來舉辦盛大的「全國詩人大會」，在大會裡更能讓古典詩壇取得主導地位與發言權。在此同時，也為于右任、賈景德二人找到可以用「演說」進行精神動員的舞台。

在過去，台灣古典詩壇的詩人大會邀請政界重要人士蒞臨演說就有其先例，如在日治時期 1924 年的「全島詩人大會」就曾邀請臺灣總督府內務局長相賀照鄉（1873.11.9-1950.11.17）致詞談東洋文明的精神。<sup>46</sup> 而戰後初期的「全國詩人大會」更是將此確立為固定流程，且成為身兼「臺灣詩壇」社名譽社長、社長的于右任、賈景德演說的舞台。而讓具有黨政身分的詩人上台演說，自然也帶入不同的思想脈絡，影響台灣古典詩壇的樣貌。正如皮耶·布赫迪厄《藝術的法則》所言：

這些當權者大多也是在尋求正當性的暴發戶，他們特別是透過沙龍這個以不著痕跡的方式階序化的世界，就與最從於流俗或者最受到認證的作家建立了來往，由是之故，從屬於權力場域所必然帶來的種種束縛，也就一併對文學場域造成了影響。<sup>47</sup>

透過戰後曾今可所建構的「臺灣詩壇」社作為渡海詩人與台灣本土詩人間相互往來的空間，在這樣類似「沙龍」的組織裡，具黨政身分的渡海詩人已悄然獲得主導地位，進而在「全國詩人大會」取得穩定的舞台、發表演說，對台灣古典詩壇進行精神動員。

長期以來，「演說」就是精神動員的基本方式，透過具領袖魅力的人物在公開場合宣揚某些價值觀，引導並統合參與聽講民眾的思考方向，作為後續行動的動力泉源。曾今可更是利用《臺灣詩壇》月刊為宣傳管道，刊登于右任、賈景德

46 見〈昨日江山樓で開かれた全島詩人大會〉，《臺灣日日新報》，1924.04.26，7版。

47 Pierre Bourdieu（皮耶·布赫迪厄）著，石武耕、李沉淞、陳羚芝譯，《藝術的法則——文學場域的生成與結構》，頁98。

等人在「全國詩人大會」上的講稿。這不只擴大以演說進行精神動員的宣傳範圍，今日更可藉此探究當時于、賈二人的演說內容。如在 1952 年賈景德〈壬辰詩人節全國詩人大會講詞〉就極力論述詩人與愛國的關係：

我們結合成千成百的詩人，更應該堅持屈原一樣的忠愛志向，發揮比屈原更大的作用力量，發揚我們的文化精神，激厲我們的民族正氣，一致努力收復大陸，挽回嚴重的劫運，解救災難的同胞，纔對得起紀念的先哲，對得起自己的國家，纔夠得上作為一個真正的詩人。<sup>48</sup>

原本「詩人節」的設定就是將端午節的屈原傳說，與愛國思想結合，成為民族想像的一部分。賈景德的演講詞則再次宣揚「端午」、「屈原」、「詩人」這些符碼與民族主義式愛國思想之關聯性，形成「端午—屈原—詩人節」的愛國思想精神結構。而這樣的精神結構，在後續的全國詩人大會裡也衍生出連結台灣歷史的論述脈絡，如到了 1955 年賈景德所發表的〈乙未詩人大會開會致詞〉說到：

我們為什麼在今天端午節紀念大詩人屈原呢？就是因為他忠於楚懷王，愛他的楚國，在五月五日投汨羅江而死的。……民主抗日的邱仙根，更是詩人，以及乙未一役中的唐景崧、俞明震、易順鼎、姚文棟還都不是詩人麼？<sup>49</sup>

因為當年正值乙未割台一甲子，全國詩人大會也特別為此在台南舉辦，而賈景德則藉機發揮，將詩人節的愛國精神與乙未割台時台灣民主國的相關人物在演說裡提出。雖然當中只有邱逢甲是台灣本地詩人，其他都是清帝國派駐台灣的官員，但也可見賈景德極力想連結「詩人節」、「屈原」與台灣歷史、愛國思想之間的關聯性。而在翌年，于右任〈丙申詩人節大會演說〉講詞中也提到：

48 賈景德，〈壬辰詩人節全國詩人大會講詞〉，《臺灣詩壇》3 卷 1 期（1952.07），頁 3。

49 賈景德，〈乙未詩人大會開會致詞〉，《臺灣詩壇》9 卷 1 期（1955.07），頁 3。

追憶日據時代，有志之士，以詩教互通聲氣，傳達思想，為民族爭生存，為文化爭地位，卒能很快的光復故物。前代詩人的艱辛奮鬥也如此，現在又到了另一個時代。臺灣在此大時代中，成了反攻復國的基地，自由民主的燈塔。對於鼓舞士氣，激勵人心，詩人仍須奮勇負擔。臺灣之詩教過去會保衛了臺灣，將來更進而光復祖國，解救被奴役的同胞，這是可以做到的。<sup>50</sup>

在演說裡將日治時期台灣詩人作詩吟詠視為是對日本殖民政權的抵抗，為存續民族與文化而努力，最終迎來「光復」的局面。日治時期台灣古典詩人的創作，從身分認同與政治立場觀之，其立場相當複雜。固然有抵抗日本殖民者，但也有刻意模糊不表態或是親日者，反映詩人所處的時代特殊性與幽微心境。但于右任所採取的立場則是將台灣過去的詩壇歷史與民族主義式的愛國思維連結，進而期許詩人可以發揚這樣的精神，用以保衛台灣、光復祖國。這樣的論述在如今看來多有牽強之處，但于右任之所以如此表示，最初就不是要闡述歷史的真實，而是要將台灣過去的歷史脈絡與愛國思維，以及當時的反攻國策結合。再透過他在古典詩壇無人能挑戰的地位，以「演說」形式所作的精神動員。

或許是當時于右任在古典詩壇的領導地位無可撼動，為了宣揚國策，他也曾大膽提出與古典詩壇調性相反的說法，試圖引導詩人的創作習慣。在 1958 年的〈戊戌詩人大會演詞〉就提到：

詞的興起，是一種革命，它把詩韻分的分，合的合，來了一次大的調整。元曲又是一種革命，那些作者認為詞韻的調整還不夠，所以中原音韻，連入聲都沒有了。現在國家推行的是國語，而我們作詩用的是古韻，這樣一來，不知埋沒了多少天才，損失了多少好詩。古人用自己的口語來作詩，我們用古人的口語來作詩，其難易自見。我們要想把詩化難為易，和接近大眾，第一

50 于右任，〈丙申詩人節大會演說〉，《臺灣詩壇》10卷6期（1956.06），頁38。

先要改用國語的平仄與韻。<sup>51</sup>

在這次的講詞中，于右任以宋詞、元曲因為時代跟語言的變動而產生新的創作為例，主張要改變過去以「平水韻」作詩的習慣，改以國語「中華新韻」當作作詩的韻腳。且希望作詩要符合當代的口語，也就是朝貼近大眾的白話前進。而這樣的呼籲也符合當時推行國語的政策，透過演說所進行的精神動員。

在後期全國詩人大會的講詞中，不再只是籠統的宣揚愛國精神，更是強調反共抗俄的冷戰對立思維。如在 1958 年賈景德〈戊戌詩人節自由中國詩人大會講詞〉中，不但要詩人「鼓吹反共抗俄建國的精神」，更要詩人「不負今日自由中國詩人的使命」。<sup>52</sup>而翌年賈景德更在其〈庚子詩人節全國詩人大會開會詞〉提到：

日月不居，時光如駛，全國詩人在臺灣寶島慶祝詩人節，迄今已有十一次了。回溯十一年來政府在臺灣整軍經武生聚教訓，實施民主、國防、經建、政治、文教各方面，都有飛躍的進步，不僅足以保障西太平洋，並且完成反攻大陸的準備，扭轉世界的形勢。自由中國以及僑居海外的詩人，在這些年來，為反共而奮鬥，為復國而謳歌，對於發揚民族正氣，振作人心，激勵忠勇，也盡到莫大的力量，無形中的精神效果，是不可計算的。<sup>53</sup>

在講詞裡將過去在台灣為慶祝詩人節的「全國詩人大會」<sup>54</sup>與反共復國的整軍經武，以及西太平洋第一島鏈的保衛結合，鼓勵詩人持續進行相關創作，形成精神力量來為民族國家盡力。這也充分體現「全國詩人大會」中的「演說」其實就是

51 于右任，〈戊戌詩人大會演詞〉，《臺灣詩壇》14卷5期（1958.05），頁26。

52 賈景德，〈戊戌詩人節自由中國詩人大會講詞〉，《臺灣詩壇》14卷5期（1958.05），頁29。

53 賈景德，〈庚子詩人節全國詩人大會開會詞〉，《臺灣詩壇》17卷1期（1960.02），頁38。

54 所謂過去11年在台灣慶祝詩人節的說法，應是從曾今可最早於1948年邀集台灣本地詩人與台灣警備總司令部副司令鈕先銘的雅集聚會開始算起，但當時賈景德仍在中國大陸擔任銓敘部長。可見這項資訊應是曾今可所提供，也可見曾今可在「全國詩人大會」背後運作的身影。

具黨政身分的渡海詩人進行精神動員的舞台，向與會的詩人宣揚民族主義的愛國精神與相關國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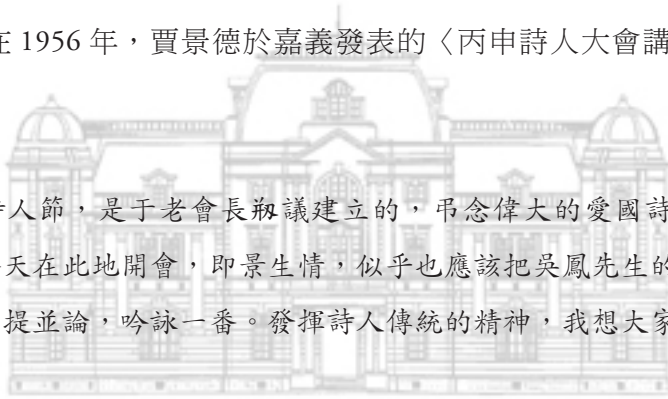
在「演說」之後就進入實際創作活動，「全國詩人大會」的創作活動多採「擊鉢吟」方式進行，所謂的擊鉢吟是一種限題、限體、限韻、限時、限地的活動模式，此乃延續日治時期台灣詩社活動或詩人大會的固定模式。由主辦方邀集詩人於特定時間、地點舉辦。詩人必須依照現場公告的題目、韻腳與體裁，在時間內交稿。主辦方則會將收來的詩稿交由「詞宗」現場評選，「詞宗」評選完成後，則會將獲獎詩稿依照名次現場榜示或吟唱，以示公信。在這過程中，「命題」是影響現場創作的重要環節之一。

以擊鉢吟進行創作活動的「全國詩人大會」只是通稱，1953年後舉辦大會時都以「○○詩人節自由中國詩人大會」，搭配當年的干支，作為活動的正式名稱。如「癸巳詩人節自由中國詩人大會」、「甲午詩人節自由中國詩人大會」。這就顯現這項活動其實帶有相當濃厚的民族主義色彩。因此在命題邏輯上，「全國詩人大會」的題目也多從抓緊民族主義與台灣的關係進行發想。延續中日戰爭時期重慶文壇將「端午—屈原—詩人節」緊密結合的民族主義精神結構，搭配台灣的歷史脈絡與當時情境來命題。在民俗節慶「端午」，結合以民族主義設定的「詩人節」，<sup>55</sup>來紀念「愛國詩人」屈原，這樣的論述就已奠定詩人大會命題的基調。當中有明確以屈原結合民族主義作為主要題目者，如「弔有民族正氣的屈靈均」（1952），或是相關衍生概念，如「詩人節」、「角黍」（1951）、「競渡」（1953），這都是引導詩人書寫方向的詞彙。在「詩人節」本身就結合端午、屈原與愛國精神的情況下，這個詞彙也多次出現在詩人大會徵詩與擊鉢的題目中，如「甲午詩人節大會歡迎越南大詩家阮文心先生」（1954）、「乙未詩人節台南舉行全國詩人大會」（1955）、「戊戌詩人節自由中國臺東大會」（1958）、「庚子臺中市詩人節感懷」（1960）等。當中還有將「詩人節」與台灣相關歷史巧妙結合者，

55 節日的設計在現代民族國家中，本身就帶有宣揚民族主義的意味，如「建國／獨立」紀念日，或是偉人、烈士的誕辰、忌日等，都常被設定為具紀念意義的節日。

如「辛卯詩人節紀念鄭成功」、「辛卯詩人節懷沈斯庵」（1951）、「臺灣民主抗日六十周年紀念」（1955）。也有直接以台灣歷史人物或景點為題者，如「詠吳鳳」（1956）、「五日登八卦山」、「鹿港觀潮」（1957）。當中無論是鄭成功、沈光文，還是吳鳳，在過去與「詩人節」並無關係，但在此時都成為「詩人節」的歌詠對象。這當中自然是想將台灣的歷史、文化與景點，都納入一個「自由中國」民族主義式的想像。<sup>56</sup> 這樣的傾向，其實從1951年最初「全國詩人大會」，由于右任提出的徵詩題目「臺灣是民主自由之燈塔」就能明顯看到，而後續各年的命題只是延續此基調做進一步闡發。

而由具有當政高層身分的渡海詩人來命題，在當時「全國詩人大會」幾成常態。如林熊祥在1953年〈癸巳詩人大會獻詞〉提到：「沁水賈煜如先生為命吟詠之題，曰『癸巳端午感事』，曰『競渡』。」<sup>57</sup> 可見當年首、次唱的題目都是由賈景德所擬。在1956年，賈景德於嘉義發表的〈丙申詩人大會講詞〉裡也如此說：



端午名為詩人節，是于老會長勳議建立的，弔念偉大的愛國詩人屈原先生的。我們今天在此地開會，即景生情，似乎也應該把吳鳳先生的事蹟，拿出來和屈原相提並論，吟詠一番。發揮詩人傳統的精神，我想大家一定樂於贊同吧。<sup>58</sup>

所謂的「樂於贊同」並非徵詢在場詩人的意見，而是賈景德早已定好題目，在題目正式公告前進行演說，引導詩人書寫他所希望的愛國面向，當日首唱即「弔屈原」、次唱為「詠吳鳳」。

由此可知，「全國詩人大會」的創作活動在「命題」上已由具黨政身分的渡

56 自1951年到1960年全國詩人大會的詩題可參見附錄列表。

57 林熊祥，〈癸巳詩人大會獻詞〉，《臺灣詩壇》5卷1期（1953.07），頁2。

58 賈景德，〈丙申詩人大會講詞〉，《臺灣詩壇》10卷6期（1956.07），頁39。

海詩人所掌控。而由于右任、賈景德、曾今可等人主導的全國詩人大會，在初期的命題上就充滿民族主義的基調，並試圖連結台灣的歷史、人物與景點，而以此引導參與詩人的創作方向。

除「命題」之外，影響創作的另一個環節則是「評選」。「評選」不只是評定作品的等第，更決定「全國詩人大會」所欲表彰的對象與價值觀，也宣示經過「演說」、「命題」這些過程所帶來精神動員的成果，以榮譽感來激勵其他詩人仿效。在此同時，有了《臺灣詩壇》月刊這樣的詩刊雜誌做為媒介，不只刊印迅速，更可藉由《臺灣詩壇》的發行通路將這些詩作傳遞到海外讀者面前。<sup>59</sup>而今日也可透過《臺灣詩壇》所刊載經「評選」的作品，一探蘊含其中精神動員的跡象。

在1951年籌辦「全國詩人大會」時，就讓《中央日報》公布預先徵詩的報導，在當時的徵詩條件雖然「不限體韻」，但評選出的作品在書寫上卻已帶有民族主義式的愛國思維。在當時由《臺灣詩壇》月刊刊出台北林述三與高雄鄭坤五的詩作都呈顯這樣的基調：

詩人令節值天中，序為開臺感鄭公。孤立忠臣稱國姓，是真名士亦英雄。荷蘭醜虜應驅逐，李晉基唐尚建功。今日中山堂上會，大招心駕楚民風。（林述三〈辛卯詩人節紀念鄭成功〉）<sup>60</sup>

回首三百年，中原淪異族。何期東海中，文光啟荒服。展轉來者誰，故明沈太僕。絕島當首陽，操行比孤竹。環境非鄭和，使命異徐福。詩社創東吟，慷慨歌當哭。可憐明大廈，終難支一木。佳節憶詩人，今朝堪告祝。清日已衰亡，臺灣兩光復。指日慶中興，凱歌旋大陸。（鄭坤五〈辛卯詩人節懷沈

59 如前所述《臺灣詩壇》的發行圈不僅限於台灣，還擴及海外多地詩人。

60 林述三，〈辛卯詩人節紀念鄭成功〉，《臺灣詩壇》1卷2期（1951.07），頁3。

斯庵〉) <sup>61</sup>

從徵詩的「評選」結果就可看出，林述三、鄭坤五二人雖然題目、體裁都不同，但在書寫中卻已開始闡述「端午—屈原—詩人節」民族主義愛國思想的精神結構，以及台灣歷史人物與這個精神結構的關聯性。而當年「全國詩人大會」擊鉢獲得右元的張達修，其〈角黍〉詩也寫到：

風味依然帶楚湘，包金裹玉綴端陽。稜稜待佐黃龍酒，更向三閭弔國殤。<sup>62</sup>

詩作內容以粽子作為創作起點，在開端帶出端午節的情境。詩作後半引用岳飛「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爾！」<sup>63</sup>的典故，表達期待反共復國後，以酒佐粽來慶祝並慰悼屈原及犧牲將士。這樣的內容正符合舉辦「全國詩人大會」所欲提振的愛國思想，所以在「評選」後名列前茅。

在「命題」時已將民族主義愛國思想與台灣歷史連結，而創作後經「評選」的作品更是充分展現如此面向。如在 1955 年的全國詩人大會首唱題目就是〈乙未詩人節臺南舉行全國詩人大會〉，當時獲得右元的高雄郭淵如之詩作寫到：

乙未騷人萃一堂，南州故郡盛文章。時逢弔屈端陽節，跡寄降苻赤嵌疆。荊棘銅駝憐大陸，蒲觴角黍感他鄉。靈均魄與延平志，藉作王師定八荒。<sup>64</sup>

在詩作裡將來自「端午—屈原—詩人節」與台灣歷史中的鄭成功事蹟合併歌頌，正符合前述賈景德〈乙未詩人大會開會致詞〉中的內容，體現經「演說」、「命

61 鄭坤五，〈辛卯詩人節懷沈斯庵〉，《臺灣詩壇》1卷2期（1951.07），頁5。

62 張達修，〈角黍〉，《臺灣詩壇》1卷2期（1951.07），頁18。

63 見（元）脫脫等著，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宋史》（台北：鼎文書局，1978），頁11390-11391。

64 郭淵如，〈乙未詩人節臺南舉行全國詩人大會〉，《臺灣詩壇》9卷1期（1955.07），頁22。

題」，再經「評選」出符合精神動員價值觀的作品。

透過「全國詩人大會」長期的宣揚與運作，就連看似與民族主義愛國思想最不相干的題目，經「評選」拔得頭籌的作品，也充滿濃厚的愛國氛圍。如1958年在台東舉辦的全國詩人大會次唱題目為〈太平洋〉，分別獲得左右元的作品就寫到：

東溟一望浪滔滔，日艦已沉未息濤。今後狂瀾誰倒挽，太平洋泛太平艘。（左元 李長春）<sup>65</sup>

東流無際水滔滔，綠島飛帆泛碧濤。巡弋艦艙軍十萬，中興聲浪海天高。（右元左六九 歐子亮）<sup>66</sup>

在李長春詩中，透過對太平洋的瞭望與過去歷史的想像，陳述在日本戰敗投降後的是結局是仍然動盪，期盼可以倒挽狂瀾，恢復太平時期。當中雖未明言，但從「倒挽」一詞實蘊含著要改變、逆轉當時狀況，實則是寄託反共復國的愛國意識。而歐子亮詩裡則更直接描述有海上軍艦跟軍隊，還有如太平洋般洶湧的「中興」氣勢，同樣寄託愛國的意識。

由上述可知，曾今可在戰後逐步串連起台灣本地詩人與渡海詩人的來往，組織「臺灣詩壇」社，進而讓具有黨政身分的渡海詩人取得優勢地位，並透過「全國詩人大會」的舉辦，以「演說」、「命題」與「評選」等方式進行精神動員。正如皮耶·布赫迪厄《藝術的法則》中所言：

透過在此進行的交流，這些沙龍同時也是各個場域之間真正的聯繫：握有政治權力的人試圖將他們的觀點強加在藝術家身上，……將藝術家把持的認證

65 李長春，〈太平洋〉，《臺灣詩壇》14卷6期（1958.05），頁30。

66 歐子亮，〈太平洋〉，《臺灣詩壇》14卷6期（1958.05），頁30。

與正當化權力占為己有。<sup>67</sup>

「全國詩人大會」的舉辦，除讓于右任、賈景德在大會中可以發表例行「演說」，更利用擊鉢吟的活動模式，掌握「命題」的權力，讓詩人順著題旨的方向來創作，再透過「評選」找出最符合其意識形態的作品，並透過榜示、刊印這些作品向大眾宣揚，藉此來達到精神動員的目的，也將民族主義式的愛國思想刻劃在詩人的心裡與作品中，形成當時古典詩書寫的典範。

#### 四、詩刊課題徵詩的長期動員

在每年舉辦的「全國詩人大會」，可見具有黨政身分的渡海詩人透過多層次的機制進行精神動員。但在其他時間，《臺灣詩壇》月刊則以課題徵詩的方式持續精神動員的效益。原本精神動員就需要長時間的投入和維持，將愛國情感透過一次又一次的激勵，才能保持長期的動能。每年舉辦的「全國詩人大會」雖然盛大，但只能在端午節舉辦。而《臺灣詩壇》每月發刊，且從初期就定期舉辦課題徵詩的活動，適足以作為延續精神動員的機制。《臺灣詩壇》的課題徵詩在二個月前就公布徵詩課題的題目、韻腳與體裁，其後需一個月的時間收件，一個月評選與編印，如在第1卷第1期公告的第一期徵詩「赤嵌城懷古」，在第1卷第3期才公布評選結果。由於投稿時間較長，且都是用郵件遞送詩稿，因此也常有台灣以外的詩人投稿，如香港、泰國，這也彌補「全國詩人大會」只能限時、限地舉辦的限制，更擴大精神動員的範圍，在台灣詩人之外更擴及海外詩人。

在《臺灣詩壇》的課題徵詩活動與「全國詩人大會」相較沒有「演說」的環節，但在「命題」與「評選」上都掌握了絕對的權力。不僅「命題」是《臺灣詩壇》所擬定，且「評選」的詞宗亦為《臺灣詩壇》所挑選，以確保能用題目引導創作，更讓創作符合精神動員價值觀的機制。也因此《臺灣詩壇》在「命題」上，

67 Pierre Bourdieu (皮耶·布赫迪厄) 著，石武耕、李沅沅、陳羚芝譯，《藝術的法則——文學場域的生成與結構》，頁100。

也常出現延續「全國詩人大會」思考脈絡的題目，如1951年第一期徵詩以「赤崁城懷古」為題，當年「全國詩人大會」的徵詩題目之一就是「辛卯詩人節紀念鄭成功」，不僅連結台灣的歷史脈絡，更將「詩人節」與鄭成功的事蹟相提並論，納入民族主義愛國精神結構的一部分。而此次課題徵詩前二名的作品，也展現相似的思考脈絡：

故壘斜陽外，岑樓大海東。紅夷留勝跡，青史紀孤忠。武庫降圖在，王城霸業空。倚欄摩舊劍，翹首氣如紅。（台北 龔嘉英）<sup>68</sup>

幾歷滄桑劫，登臨感不窮。南來王氣盡，北伐霸圖空。壁古腥雲黑，磚餘血淚紅。樓頭華表月，夜夜弔孤忠。（大溪 簡伯仁）<sup>69</sup>

「赤崁城」即今日赤崁城，只是過去因為「崁」與「崁」的台語音近而寫成不同的文字。赤崁城興建於荷蘭統治時期，原名「普羅民遮城」。1661年4月鄭成功攻陷此城，作為承天府衙門。其後雖經歲月與戰亂摧殘，當時遺構與歷代增建之建築，仍保存至今日成為國定古蹟。自清領時期就有赤崁樓懷古之詩作，大多只是藉此抒發撫今追昔的感嘆。<sup>70</sup>而《臺灣詩壇》的課題徵詩，讓詩人透過對赤崁城相關歷史的重新記憶，帶出明末鄭成功對於明朝的忠誠，在北伐南京失利後，轉而攻取台灣作為反清復明基地的過往。而這段歷史也呼應當時中華民國政府喪失中國大陸的領土，卻構思如何恢復故國的心緒，在撫今追昔中置入當時反攻復國的意念。

在足以連結台灣與民族主義愛國思想的節日課題裡，對於反攻復國意念的引

68 龔嘉英，〈赤崁城懷古〉，《臺灣詩壇》1卷3期（1951.08），頁16。

69 簡伯仁，〈赤崁城懷古〉，《臺灣詩壇》1卷3期（1951.08），頁16。

70 如清領時期本地生員林麟昭、王鳳池、章甫，遊宦官員覺羅四明都有同題詩作，但詩作內容旨在抒發歷史陳跡的滄桑感。

導也發揮得淋漓盡致。如在 1955 年〈臺灣光復十周年〉的課題徵詩，前二名的作品：

大陸東南一葉浮，彼蒼留取建鴻猷。十年慘淡敷新政，五紀淪胥滌舊羞。  
赤焰中原成火宅，綠陰半壁繫神州。延平昔志從今繼，還我河山復自由。  
(福建 葛曉凡)<sup>71</sup>

悠悠十載客心驚，回首中原百感生。甫逐鯨鯢離海嶠，驚遭豺虎踞神京。  
霸齊且喜逾千里，復夏從知只一成。憑此中興光宇宙，春臺衽席慰與情。  
(湖北 李揚新)<sup>72</sup>

題目是台灣光復十周年的紀念，詩作內容如「五紀淪胥滌舊羞」、「甫逐鯨鯢離海嶠」等語也帶到台灣過去殖民的歷史，但詩作大部分還是著重在這十年間中國大陸淪陷，中華民國政府撤至台灣試圖反攻大陸的過程。這樣的「評選」結果就呈現「命題」裡「十周年」的意義，詩人唯有體認到十年間的時代變局與政府在反攻復國精神動員的方向，方能在徵詩課題中名列前茅。相似的情況也出現在 1960 年〈雙十節適逢重九日感賦〉的課題徵詩，當時前二名的詩作就寫道：

雙十又重陽，黃花色自莊。盛筵觴菊酒，高會佩萸囊。放眼登層巖，低頭念故鄉。何時師渡海，天府發瑤光。(曼谷 雲民英)<sup>73</sup>

中華開國日，海角遇重陽。十載逃秦網，三秋憶梓鄉。感懷同醅酌，矢志復

71 葛曉凡，〈臺灣光復十周年〉，《臺灣詩壇》9卷5期(1955.11)，頁24。

72 李揚新，〈臺灣光復十周年〉，《臺灣詩壇》9卷5期(1955.11)，頁24。

73 雲民英，〈雙十節適逢重九日感賦〉，《臺灣詩壇》16卷6期(1960.01)，頁40。

家邦。慶祝登高會，旌旗處處揚。（海南 崔龍文）<sup>74</sup>

在這個題目裡將紀念中國國民革命的武昌起義與傳統的重陽節登高，藉由當年這兩個節日同日的契機來宣揚反攻復國的意念。而由來自泰國曼谷的雲民英獲得首獎，也象徵《臺灣詩壇》的精神動員範圍擴及海外古典詩人。在其詩作前半描述重陽節喝菊酒、佩茱萸、登高望遠的傳統活動，但詩末筆鋒一轉，將登高望遠與思鄉連結，轉而提出渡海反攻大陸的呼籲。而崔龍文的詩作也呈現同樣的意念，更期待恢復家國，讓慶祝登高的盛會旗幟在故國到處飄揚。由此可見，《臺灣詩壇》透過每月課題徵詩的「命題」與「評選」機制，同樣也能達到引導創作、進行精神動員的效果。

透過「命題」與「評選」機制，《臺灣詩壇》在每月進行的課題徵詩也能達到精神動員的作用。針對當時冷戰時期軍事衝突所造成的事件，也都成為課題徵詩的出題方向。

1950年6月韓戰爆發，「朝鮮人民軍」進攻「大韓民國」，以美軍為首的聯合國部隊在仁川登陸積極反攻。同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標舉「抗美援朝」的口號，派遣「中國人民志願軍」參戰。這是冷戰時期兩大陣營激烈軍事對抗之一，動員軍隊人數達數百萬。直到1953年7月27日，兩大陣營才宣告停戰，隨後進行戰俘交換。其中「中國人民志願軍」有14,235人表達前往台灣的意願，而中華民國政府則將這批人稱為「反共義士」，不僅舉辦盛大的歡迎儀式，更將其抵台的1月23日訂為「自由日」。

這批「反共義士」在1954年1月23日抵達台灣，《臺灣詩壇》在當年2月就發出徵詩啟事，以「喜義士歸國」為課題，並於4月刊出詩作。當中獲得左右元的作品寫到：

---

74 崔龍文，〈雙十節適逢重九日感賦〉，《臺灣詩壇》16卷6期（1960.01），頁40。

寢饋心懷故國時，胡天遙想漢旌旗。子卿大節文山氣，慷慨悲歌篆史詩。

（左一 福建 丁滌凡）<sup>75</sup>

去虜來廷若羽馳，中原父老望旌旗。會看淨掃妖氛日，正是還鄉衣錦時。

（右一 香港 劉耀筴）<sup>76</sup>

丁滌凡詩中讚許這些反共義士心懷故國，就有如漢代蘇武（子卿）、宋末文天祥（文山）一般有著不願降敵的高尚志節，而劉耀筴詩裡更希望未來能與這些反共義士一同反攻復國、衣錦還鄉。透過這些「評選」後的詩作不難看出，當時精神動員朝反攻復國的方向宣傳，而讓作品產生相近的價值觀。

在《臺灣詩壇》的課題徵詩與冷戰時期軍事衝突相關者，還有 1955 年的「一江山戰役」。一江山島位於浙江台州灣出海口，在大陳島西北方。在中華民國政府退守台灣之後，在中國大陸沿海仍保有多個島嶼作為攻守基地，大陳島周邊島嶼就是其中之一。當年 1 月 18 日清晨中華人民共和國解放軍華東軍區發動對一江山島的攻擊計畫。在陸海空三軍協同作戰的優勢下，戰鬥僅歷時二天，解放軍攻占一江山島，此後也迫使中華民國政府自大陳島撤退。「一江山戰役」是冷戰時期兩大陣營在各地軍事衝突之一，而《臺灣詩壇》在同年 2 月出版的第 8 卷第 2 期的定期徵詩、徵詩鐘啟事裡，指定題目同為「一江山」。且同時也刊出多首對此戰役的詩作，當中以賈景德〈一江山〉一詩為首：

一江山，一江山，三字寫出心悽酸。自從奸匪竊據在大陸，賴有衛星島嶼環臺灣。此島面積本不大，長三百丈二里寬。岩石結成雙禿峯，童山濯濯飲水難。奸匪試探美國協防是否有真意，敢在海峽使用人海戰術開禍端。金門大陳無情轟炸不休歇，艦船炮艇更向一江小島掀波瀾。戰鬥英雄地區司令王生

75 丁滌凡，〈喜義士歸國〉，《臺灣詩壇》6卷4期（1954.04），頁20。

76 劉耀筴，〈喜義士歸國〉，《臺灣詩壇》6卷4期（1954.04），頁20。

明，所部游擊壯士以一當百俱桓桓。冒險克難在前哨，宣誓歃血猶未乾。邇來戰事愈激烈，地小不足迴旋催心肝。彈盡援絕無一作俘虜，七百二十烈士殺身成仁志節完。噫吁嚱！太原五百完人已罕見，十倍黃花崗上烈士名不刊。我向烈士致敬意，忠貞氣節千古傳。匪寇侵略暴行慘無比，愛國志士切齒痛恨皆纓冠。海峽戰爭瞬息變成全面戰，激起民族精神動員彌足歡。腳踏英烈血跡向前進，翹盼雪恥復國將帥齊登壇，反攻大陸開始一江山。<sup>77</sup>

此詩雖以長體古詩的形式呈現，在詩作內容上則以接近國語白話的口吻陳述一江山戰役。<sup>78</sup> 詩中描述一江山這座蕞爾小島，卻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試探美國協防台灣決心的試驗地。在轟炸金門、大陳做為佯攻與阻援，再利用艦艇群與前海戰術攻向一江山島。詩作後半則依循當時政府公開宣揚的說法，陳述島上 720 名將士全部為國殉難的悲壯事蹟。與賈景德詩作同一期還有張慕陶〈弔一江山殉國諸烈士〉、彭國棟〈一寸江山一寸血〉、張相〈一江山〉、陳南士〈一江山將士成仁歌〉、李本蕃〈七百壯士〉等作，同樣是描述一江山戰役，全體官兵為國殉難的內容。這些詩人不像賈景德位居樞要，但都能對此事抒發其感，可見在當時的台灣曾對此事進行全面性精神動員的跡證。

從戰史上的相關例證可知，再也沒有比堅守絕境直到全部殉難的壯烈敘事，更能激起民族主義的愛國熱情，因此也常作為被攻擊方對內宣傳的重要議題。如 1949 年國共內戰的太原戰役後，台灣對於「太原五百完人」的宣揚，並 1951 年建立「太原五百完人紀念碑」，更編寫歌曲，或將事蹟編入中小學教科書歷史、國語教科書。雖然事後考察實際上殉難人數未及此數，且部分乃病死、在別處戰死或是倖存者，與實際狀況不符，但在當時仍達到精神動員的宣傳效果。<sup>79</sup> 由此

77 賈景德，〈一江山〉，《臺灣詩壇》8卷2期（1955.02），頁10。

78 此詩韻腳以「平水韻」的上平十四寒韻、十五刪韻與下平一先韻為韻腳，雖然古體長詩的韻腳可以選擇鄰韻通押，但畢竟少見，反而比較像以國語的「ㄎ」作為韻腳來創作。

79 又如 2022 年 2 月 24 日烏俄戰爭初期，俄羅斯以優勢兵力攻陷「蛇島」，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立即於電視演說中宣稱守軍已全數陣亡，追授「烏克蘭英雄」稱號，並於同年 4 月 12 日為此事件發行紀念郵票。雖然事

觀之，當「一江山戰役」這樣的軍事衝突發生，在當下注重的並不是事件的真實面，而是其精神動員的效益。<sup>80</sup> 在現今的台北市、新北市、嘉義市等地都有紀念碑，於台北市更有「一江街」紀念此事，這就是當時以此事件進行精神動員的遺跡。因為這個戰役而立碑、命名，這些措施就類似世界各國的「無名戰士紀念碑」，都是用來宣揚為民族犧牲的共同體想像，向民眾進行精神動員的產物。<sup>81</sup>

《臺灣詩壇》應是呼應這股精神動員的風潮，立即在戰役隔月發出徵詩啟事，更在 2 個月後的第 8 卷第 4 期刊出。原本，報紙報導與社論會造成發行圈內形成一定同質性的想像，民眾則透過每天閱讀報紙而進入這個想像的「同時性」之中，進而產生彼此都是共同體想像的一部分。而《臺灣詩壇》再次以當時報紙報導的軍事衝突為題目，讓詩人以此進行書寫，再經詞宗評選後發表刊印，更是再次確認彼此正是共同體一員的舉措。因為從報導來源、詩人接收並以之創作，再到評選、刊印的環節，都存在確保共同體想像的關鍵，進而形成萬眾一心來面對危難的想像。這也更加深彼此都是在共同體中，必須共同面對威脅的想像，來達到精神動員的效果。而這次課題「一江山」徵詩就是由賈景德評選，錄取 46 名。徵詩第一名是浙江省籍的林穎，詩云：

團焦小嶼本無名，一戰聲光舉世驚。報國莫如生殺賊，上書竟爾血成盟。燐燐白骨荒山淚，耿耿丹心故土情。後起復仇吾輩責，中原胡馬尚縱橫。<sup>82</sup>

後確認狀況為守軍遭到俘虜，但已達到對其國內精神動員與國際宣傳的效果。見三立新聞網，〈影／死前嗆俄「去你 X 的」！蛇島 13 兵殉國前最後身影曝光〉（來源：<https://www.setn.com/News.aspx?NewsID=1076969>，檢索日期：2024.06.20）。

80 雖然當時宣傳「一江山守軍」全數陣亡，但事實上仍有部分守軍遭到俘虜生還。

81 正如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所述：「沒有什麼比無名戰士的紀念碑和墓園，更能鮮明地表徵現代民族主義文化了。……儘管這些墓園之中並沒有可以指認的凡人遺骨或者不朽的靈魂，它們卻充塞著幽靈般的民族的想像。」又言「如果我們提醒自己民族能激起愛，而且通常激起深刻的自我犧牲之愛，應該不無助益吧。民族主義的文化產物——詩歌、散文體小說、音樂、雕塑——以數以千計的不同型式和風格清楚地顯示了這樣的愛。」Benedict Anderson（班納迪克·安德森）著，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2010.05），頁 48、201。

82 林穎，〈一江山〉，《臺灣詩壇》8 卷 4 期（1955.04），頁 26。

不知是巧合還是有意為之，在「一江山」徵詩課題中獲選第一名的是一江山島所在地的浙江省詩人，但這首詩也確實闡釋這個軍事衝突對台灣內部的衝擊與意義。詩作前段與賈景德〈一江山〉詩相近，描述整個軍事衝突的過程。但詩末則強調身為共同體的一份子，更應該為守土陣亡將士復仇，這也正符合整個事件裡官方精神動員的方向，亦可見經「評選」過程就能選出符合精神動員價值觀的作品。

《臺灣詩壇》透過每月課題徵詩的「命題」與「評選」，實則達到長期精神動員的效果。詩人可以透過閱讀評選後的作品，獲知《臺灣詩壇》所欲宣揚的價值觀，進而影響後續投稿課題徵詩的書寫方向。就連看似與精神動員不相干的題目，經「評選」後的作也帶有精神動員的效果。如以〈鍾馗〉為題的徵詩結果就展現這樣的情況，當時獲選的詩作寫到：

進士長才恨未酬，天中啖鬼解窮愁。神州渴望驅魔影，大展雄風護自由。  
 （安徽 王劫髯）<sup>83</sup>

陸沉莽莽嘅神州，赤鬼俄魔鬧未休。為問南山鍾進士，緣何不起阻橫流。  
 （桐城 張白翎）<sup>84</sup>

鍾馗在民間故事裡是驅鬼避邪的神祇，但在這些詩作裡所要驅除並非傳統的鬼怪，而是占據中國大陸的共產黨。詩人借題發揮，不只呈現冷戰初期的時代性，同時也顯現在《臺灣詩壇》透過課題徵詩的「命題」與「評選」來進行精神動員後，形塑民族主義式的愛國思想與反共抗俄、反攻復國的價值觀，對當時詩人創作產生的影響。

83 王劫髯，〈鍾馗〉，《臺灣詩壇》3卷2期（1952.08），頁26。

84 張白翎，〈鍾馗〉，《臺灣詩壇》3卷2期（1952.08），頁26。

## 五、結論

綜而論之，在台灣古典詩壇進行的「精神動員」主要透過「演說」、「命題」與「評選」等環節，多層次的影響詩人的創作。在此之前，具有黨政高層身分的渡海詩人就已取得詩壇的領導地位，當中的關鍵人物是渡海來台的曾今可。他藉由與台灣本地詩人及渡海詩人的來往，作為雙方交流的橋樑，進而建構出「臺灣詩壇」社、接辦「全國詩人大會」、發行《臺灣詩壇》月刊。在過程中也讓具黨政高層身分的渡海詩人，取得台灣古典詩壇「結構性從屬」的領導地位，並獲得進行精神動員的舞台。

另一方面，在詩人大會這種大型場合，曾今可只是建構這個場合的人物，實際上能站到臺前進行精神動員的，則是具有最高層級黨政身分的詩人，如于右任、賈景德。于、賈二人的存在也讓古典詩在戰後初期中華民國的文藝體制下具有一定的影響力，他們的黨政地位以及對古典詩壇的支持，壓抑新詩界的聲量，使古典詩人在「全國詩人大會」中占有詩壇的象徵地位。正如皮耶·布赫迪厄在《藝術的法則》所言：

至於作家與藝術家，則以請求者、說項者，有時甚至真的以壓力團體的姿態從事活動，藉此努力去間接對國家所分配的各種不同的物質或象徵獎勵取得控制。<sup>85</sup>

曾今可將于、賈二人推上台灣古典詩壇的祭酒地位，實借重他們的政治地位，藉此獲得各種不同的資源，以及在整個文藝體制中的象徵地位。也因此當二人相繼離世之後，不僅曾今可再也無法對古典詩壇產生影響力，整個台灣古典詩壇也失去能對社會發聲的領袖人物。就如曾今可在〈敬輓于院長右老〉二首其一詩末所呼告的「更誰堪鎮我騷壇」，<sup>86</sup>又如鍾鼎文在〈于右任先生與新詩〉一文所言：

85 Pierre Bourdieu (皮耶·布赫迪厄)著，石武耕、李沅沅、陳羚芝譯，《藝術的法則——文學場域的生成與結構》，頁100。

86 曾今可，〈敬輓于院長右老〉，《詩文之友》21卷5期(1965.03)，頁3。

于先生的詩代表一個傳統，一個時代；于先生的死，也意味著傳統的總結，時代的遑替，新詩人們應該更加努力，在民族性與時代性上作更深度的把握……。<sup>87</sup>

由上文也可見于右任等人在戰後初期的台灣文藝體制裡，有相當分量的影響力，故而曾今可將其置於詩壇的領導地位，也塑造出以渡海詩人為首、台灣本地重要詩人為副的「結構性從屬」樣貌。

在「全國詩人大會」的場合，具黨政高層身分渡海詩人的現場「演說」就成為精神動員的開端，再利用「命題」與「評選」的方式引導作品的創作。在「演說」中進行思想灌輸與情感激勵，從中引導出具民族主義愛國思想的價值觀。在「命題」上則充滿民族主義的基調，並試圖連結台灣的歷史、人物與景點，而以此引導參與詩人的創作方向。最後讓詩人大會與《臺灣詩壇》課題透過「評選」機制製造出具有位階差等的場域，讓人可以在當中競逐排名，這都讓創作趨向符合精神動員所欲塑造的價值觀。

在這過程中自然也排除了不符或是反對立場的書寫，導致這些帶有「雜音」的詩作沒辦法刊登在當時詩人大會的專輯或是詩刊，只能出現在個別詩人的著作或是手稿中。在精神動員的同時也造成一定程度的箝制作用，或導致詩人不願意參加這些與精神動員相關的活動，或是在書寫中虛應故事等方式進行反抗，反而在詩人個人的閒詠詩作中才能看到其真正的想法。

從「全國詩人大會」的公開宣示與表彰，以及《臺灣詩壇》的課題評選印行，在相關作品中或是過程中所造成的效應，都可見冷戰初期台灣古典詩壇，甚至是海外古典詩人在精神動員下所造成的影響。

---

87 鍾鼎文，〈于右任先生與新詩〉，于右任先生治喪委員會編輯，《于右任先生紀念集》（台北：于右任先生治喪委員會，1967），頁 203。

## 附錄 戰後初期由曾今可「臺灣詩壇」社主導之「全國詩人大會」詩題列表

年份	地點	大會名稱	題目
1951	台北	辛卯端午詩人節 全國詩人大會	徵詩：臺灣是民主自由之燈塔 徵詩：辛卯詩人節紀念鄭成功 徵詩：辛卯詩人節懷沈斯庵 擊鉢：角黍
1952	台北	壬辰詩人節 全國詩人大會	擊鉢：弔有民族正氣的屈靈均
1953	台北	癸巳詩人節 自由中國詩人大會	擊鉢首唱：癸巳端午感事 擊鉢次唱：競渡
1954	台北	甲午詩人節 自由中國詩人大會	擊鉢：甲午詩人節大會歡迎越南大詩家阮文心先生
1955	台南	乙未詩人節 自由中國詩人大會	擊鉢首唱：乙未詩人節臺南舉行全國詩人大會 擊鉢次唱：臺灣民主抗日六十周年紀念
1956	嘉義	丙申詩人節 自由中國詩人大會	擊鉢首唱：弔屈原 擊鉢次唱：詠吳鳳
1957	彰化	丁酉詩人節 自由中國詩人大會	擊鉢首唱：五日登八卦山 擊鉢次唱：鹿港觀潮
1958	台東	戊戌詩人節 自由中國詩人大會	擊鉢首唱：戊戌詩人節自由中國臺東大會 擊鉢次唱：太平洋
1960	台中	庚子詩人節 自由中國詩人大會	擊鉢：庚子臺中市詩人節感懷

## 參考資料

### 一、專書

- (元)脫脫等著，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宋史》（台北：鼎文書局，1978）。
- 于右任先生治喪委員會編輯，《于右任先生紀念集》（台北：于右任先生治喪委員會，1967）。
- 王明義，《三峽鎮鎮誌》（台北：三峽鎮公所，1993）。
- 林衡道口述，卓遵宏、林秋敏訪問，林秋敏紀錄整理，《林衡道先生訪談錄》（台北：國史館，1996）。
- 口述，陳三井、許雪姬訪問，楊明哲紀錄，《林衡道先生訪問紀錄》（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
- 陳建忠，《島嶼風聲：冷戰氛圍下的臺灣文學及其外》（新北：南十字星文化工作室，2018.08）。
- 曾今可編，《臺灣詩選》（台北：中國詩壇，1953.10）。
- 蘇費翔、簡若坪主編，《異口同「聲」——探索臺灣現代文學創作的多元發展》（台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2022.05）。
- Benedict Anderson（班納迪克·安德森）著，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2010.05）。
- Pierre Bourdieu（皮耶·布赫迪厄）著，石武耕、李沅沅、陳羚芝譯，《藝術的法則——文學場域的生成與結構》（台北：典藏藝術家庭，2016.02）。

### 二、期刊

- 林文龍，〈省文獻會與漢詩關係初探〉，《臺灣文獻》59卷2期（2008.06），頁137-182。
- 黃美娥，〈戰後臺灣文學典範的建構與挑戰：從魯迅到于右任——兼論新／舊文學地位的消長〉，《臺灣史研究》22卷4期（2015.12），頁123-166。

### 三、詩刊文獻

- 《臺灣詩壇》1卷2期（1951.07），封面頁。
- 「臺灣詩壇理監事名單」，《臺灣詩報》1卷2期（1949.02），頁1。

- 丁滌凡，〈喜義士歸國〉，《臺灣詩壇》6卷4期（1954.04），頁20。
- 于右任，〈丙申詩人節大會演說〉，《臺灣詩壇》10卷6期（1956.06），頁38-39。
- ，〈戊戌詩人大會演詞〉，《臺灣詩壇》14卷5期（1958.05），頁26。
- 王劫髯，〈鍾馗〉，《臺灣詩壇》3卷2期（1952.08），頁26。
- 李長春，〈太平洋〉，《臺灣詩壇》14卷6期（1958.05），頁30。
- 李俊承，〈感懷寄韜園〉，《臺灣詩壇》4卷3期（1953.03），頁22。
- 李揚新，〈臺灣光復十周年〉，《臺灣詩壇》9卷5期（1955.11），頁24。
- 林述三，〈辛卯詩人節紀念鄭成功〉，《臺灣詩壇》1卷2期（1951.07），頁3。
- 林熊祥，〈癸巳詩人大會獻詞〉，《臺灣詩壇》5卷1期（1953.07），頁2。
- 林穎，〈一江山〉，《臺灣詩壇》8卷4期（1955.04），頁26。
- 崔龍文，〈雙十節適逢重九日感賦〉，《臺灣詩壇》16卷6期（1960.01），頁40。
- 張白翎，〈鍾馗〉，《臺灣詩壇》3卷2期（1952.08），頁26。
- 張達修，〈角黍〉，《臺灣詩壇》1卷2期（1951.07），頁18。
- 郭淵如，〈乙未詩人節臺南舉行全國詩人大會〉，《臺灣詩壇》9卷1期（1955.07），頁22。
- 曾今可，〈卷頭贅語〉，《臺灣詩壇》3卷1期（1952.07），頁3。
- ，〈追懷楊仲佐先生〉，《中華詩學》4卷1期（1970.12），頁48-51。
- ，〈送柯遠芬將軍赴美考察〉，《詩文之友》11卷2、3期合刊（1959.07），頁1-2。
- ，〈創刊旨趣〉，《臺灣詩報》1卷1期（1949.01），頁1。
- ，〈發刊詞〉，《鯤南詩苑》1卷1期（1956.06），頁1-2。
- ，〈敬輓于院長右老〉，《詩文之友》21卷5期（1965.03），頁3。
- ，〈新年獻詞〉，《臺灣詩壇》4卷1期（1953.01），頁3。
- ，〈詩人在台灣〉，《臺灣詩報》1卷1期（1949.01），頁3-6。
- ，〈詩人節席上拜讀張魯老大作有「未堪賈傅風流歇，詞客淒清條二年」句感作〉，《詩文之友》16卷5期（1962.08），頁8。
- ，〈臺灣的詩社〉，《中華詩學》1卷1期（1969.06），頁44-46。
- 雲民英，〈雙十節適逢重九日感賦〉，《臺灣詩壇》16卷6期（1960.01），頁40。
- 葛曉凡，〈臺灣光復十周年〉，《臺灣詩壇》9卷5期（1955.11），頁24。

- 賈景德，〈一江山〉，《臺灣詩壇》8卷2期（1955.02），頁10。
- ，〈乙未詩人大會開會致詞〉，《臺灣詩壇》9卷1期（1955.07），頁2-3。
- ，〈壬辰詩人節全國詩人大會講詞〉，《臺灣詩壇》3卷1期（1952.07），頁1-3。
- ，〈丙申詩人大會講詞〉，《臺灣詩壇》10卷6期（1956.07），頁38-39。
- ，〈戊戌詩人節自由中國詩人大會講詞〉，《臺灣詩壇》14卷5期（1958.05），頁27-29。
- ，〈庚子詩人節全國詩人大會開會詞〉，《臺灣詩壇》17卷1期（1960.02），頁38-39。

- 劉耀彜，〈喜義士歸國〉，《臺灣詩壇》6卷4期（1954.04），頁20。
- 歐子亮，〈太平洋〉，《臺灣詩壇》14卷6期（1958.05），頁30。
- 編者，〈創刊詞〉，《臺灣詩壇》1卷1期（1951.06），封面頁。
- ，〈編後記〉，《臺灣詩壇》3卷1期（1952.07），頁40。
- 鄭坤五，〈辛卯詩人節懷沈斯庵〉，《臺灣詩壇》1卷2期（1951.07），頁5。
- 鄭品聰，〈癸巳詩人節大會經過報告〉，《臺灣詩壇》5卷1期（1953.07），頁3。
- 簡伯仁，〈赤嵌城懷古〉，《臺灣詩壇》1卷3期（1951.08），頁16。
- 龔嘉英，〈赤嵌城懷古〉，《臺灣詩壇》1卷3期（1951.08），頁16。

#### 四、報紙文章

- 〈于右任等發起 詩人大會 定詩人節集會〉，《中央日報》，1951.05.18，4版。
- 〈昨日江山樓で開かれた全島詩人大會〉，《臺灣日日新報》，1924.04.26，7版。
- 〈記首屆詩人節〉，《中央日報》，1941.05.31，3版。

#### 五、電子媒體

- 三立新聞網，〈影／死前嗆俄「去你X的」！蛇島13兵殉國前最後身影曝光〉（來源：<https://www.setn.com/News.aspx?NewsID=1076969>，檢索日期：2024.06.20）。
- 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關於『思想領導及精神動員』案談話會紀錄〉（來源：<https://www.cipas.gov.tw/stories/16?fbclid=IwAR1tP2NexxaIQXMGSKhSi-PRt0MIIlJrHucRXiFKV4ld9JHP9Y38O9D64Wc>，檢索日期：2024.06.01）。
- 蔣經國，〈民國四十年十月二十日〔手函〕〉（來源：<https://presidentialcck.drnh.gov.tw/index.php?act=Archive/preview/33832410b7d94782abb861523de6b78c>，檢

索日期：2024.06.01）。

顧敏耀，〈《正氣月刊》提要〉（來源：<https://db.nmtl.gov.tw/Site4/s3/journalinfo?jno=041>，檢索日期：2024.10.24）。

